

四世同堂讨论会
电视剧讨论会文集

·35·

中国文联出版社

251
《四世同堂》电视剧讨论会文集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编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分会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3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 1—1,800册
统一书号: 10355·681 定价: 1.50元

出 版 说 明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文艺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这个集子里收辑的十八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甚至用不同的方法论，来研究、总结这部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经验，艺术的得失，以及关于电视剧在民族化、电视剧如何改编文学名著等问题，观点也不尽相同。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这个集子出版，供广大观众、读者和电视工作者研究、参考之用。

序

胡絜青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问世以来，截至一九八五年初，在长达四十年里，没有开过专题讨论会，没有出版过评论专著。同名电视连续剧一出，情况大变。据我所知，短短几个月里，专题讨论会已开过四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当然，绝大多数是谈电视剧的，但谈小说的也大大超过以前四十年的总和。《〈四世同堂〉电视剧讨论会文集》，便是专门汇集评论电视剧的那批成果的第一部论著。我为它的诞生感到高兴。我觉得，它的价值之一首先在于第一次记载了《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命运变化的真正转折点。

大家知道，老舍创作《四世同堂》是抱着两个明确的目的的：一、“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之躯换取真正的和平。”二、“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必须要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子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抗战给文

化照了‘爱克斯光’。”扩大地说，不光在《四世同堂》里，在老舍的整个创作里，这两个主题似乎都是贯彻始终的。老舍曾为挖掘这两个主题努力奋斗了一辈子，由《老张的哲学》开始，经过《赵子曰》、《二马》、《猫城记》、《大地龙蛇》、《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直到《正红旗》止，脚步清晰可见。《〈四世同堂〉电视剧讨论会文集》对这两点都明确地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找到了这两把了解老舍作品的钥匙，也是使我非常高兴的事。我以为，从这个角度出发，电视剧《四世同堂》的编导和录制经验不光对发展我国电视剧事业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对进一步改编老舍的其他作品也是有开拓意义的。

1985.12.5

目 录

- 序 胡絜青 (1)
- 从电视剧《四世同堂》热潮中想到的 赵寻、戚方 (1)
- 民族灵魂的纪念碑
- 看电视和读小说《四世同堂》的札记 蓝翎 (32)
- 雅俗共赏非小事
- 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成就与不足 钟艺兵 (50)
- 抗战时期沦陷区历史的一面明镜
- 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时代精神 成志伟 (69)
- 论《四世同堂》 绍武、会林 (80)
- 思想深度、民族化与戏剧性
- 从电视剧《四世同堂》获得的几点启示 谭需生 (102)
- 迷人之谜 舒乙 (117)
- 论电视剧《四世同堂》艺术上的得失 蔡骥 (131)
- 老舍风格的执著追求
- 评电视剧《四世同堂》 高鑫 (152)
- 小胡同，大工程
- 电视剧《四世同堂》
- 为什么能拨动亿万观众的心弦？ 王云缦 (161)

改编应谨防政治功利主义

——从电视剧《四世同堂》“加红线”谈起……沈卫星 (173)

电视剧《四世同堂》改编中的

人物形象结构分析 贺绍俊 (184)

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的祁老爷子

——记邵华同志 辛述威 (194)

心得与教训

——改编《四世同堂》的体会 李翔 (205)

深沉凝重的爱国篇章 张永经 (213)

《四世同堂》播出的前前后后 赵正晶 (216)

综合艺术的光彩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创作工作回顾 徐宏 (233)

后记 (251)

从电视剧《四世同堂》 热潮中想到的

赵寻、戚方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映，在我国的亿万电视观众和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热烈的反响，得到了普遍的好评。这恐怕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中很令人注目、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艺术现象。

一

应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四世同堂》“热”。

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用十分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北京电视台最初播映这部电视剧时，在首都广大观众中所引起的轰动情景：

自暮春至盛夏，每到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映时间，北京市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电视机旁老少同堂，翘首观看。街市上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的晚归者，无不行色匆匆，生怕漏看其中一集……

然而，严格来说，这还仅仅是这场《四世同堂》“热”的“序幕”或“前奏”。当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这个节目，许多地方电视台也纷纷竞相转播时，上述那种盛况，便由北京一隅，迅速地扩展；波及到了全国的大小城市和村镇。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四世同堂》“热”，才达到了真正的高潮。电视剧《四世同堂》，成了我国文艺家奉献给这个全民族节日的一份珍贵的、“雪中送炭”的礼品。它的成功播出，为节日增加了光彩、丰富了内容，为广大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锦上添花”。

我国至今还没有对电视观众收视率的可靠统计，如果每集有二亿人观看，那么整个电视剧《四世同堂》的观众大概可以达到六十亿人次。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曾就电视剧问题，在首都车站、天安门前和大街小巷作过一次街头即兴采访，以征求观众对电视剧的意见和要求。被采访的对象包括来自全国不同地区、职业、年龄的旅客和本市的居民。这些受到采访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看了这部电视剧，并给了它众口一辞的称赞，认为它是最近一个时期最好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映期间，许多家庭都把观赏这个节目当成了“雷打不散”的大事。顾

中人物的命运，成了千千万万观众关切、思索和经常议论的话题。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火车上、飞机航班上、旅店和饭馆里，你都能随时听到人们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着这个剧目。“小羊圈胡同”里那些善良、纯朴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悲欢离合，真正牵动了观众的心。

这部电视剧，不仅把具有极不同的经历、年龄差别很大的人吸引到电视屏幕前，而且还把不少人吸引到老舍据以作为生活原型的那条北京的、鲜为人知的小胡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好奇的、寻根究底的青年人，纷纷去采访或探询被认为就是“小羊圈胡同”的那条偏僻小巷，惊动了长年生活在那里的、从来不曾抛头露面的老居民。他们还有幸第一次被摄进了电视镜头。连采访他们的电视节目都给亿万观众带来了极大满足。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种由《四世同堂》诱发的“寻根热”吧！

《四世同堂》“热”，又诱发了“老舍热”。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评价和足够重视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因成功地搬上了电视屏幕，而被千千万万人所“重新发现”，使他们叹服不已。对同名电视剧的浓厚兴趣，又诱发了人们直接阅读文学原著的浓厚兴趣。书店里长期积压的小说《四世同堂》，马上由滞销变为畅销，以至于脱销。图书馆里的《四世同堂》被抢借一光。这样还不够。对小说和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浓厚兴趣，更进一步诱发了对老舍的其他著作的兴趣。人们突然发现，老舍本人虽然没和电视打过交道，可他的许多作品却是很适合改编成电视剧的。不少人，正在为此而跃跃欲试。据说，受到《四世同堂》成功改编的鼓舞和启发，有的人已经开始酝酿把老

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搬上电视屏幕了。

《四世同堂》“热”所带来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新鲜事”，是我国文苑长期遭到冷落，几被遗忘、近于绝响的古老曲艺形式——京韵大鼓，又引起人们刮目相看。这部电视剧刚播过前几集，那首用京韵大鼓曲调改编谱成、由名曲艺演员小彩舞演唱的《四世同堂》片头主题歌，就已经风靡全国、四处传唱，甚至连幼儿园呀呀学语的娃娃们，都在哼唱“重整山河待后生”了。前不久，《北京晚报》还刊登了要求录制、出售这支主题歌的磁带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对目前市场上“流行歌曲”磁带充斥的状况，发出了不满和抱怨。这支主题歌，以其充满爱国激情、凛然正气和历史感的歌词征服了观众和听众，震动了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了崭新的、不同凡响的艺术感受。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它也得到了广大青年的接受和喜爱。《四世同堂》的京韵大鼓主题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发现”，使他们“耳目一新”。这对于长期受到冷落的京韵大鼓，无疑是一种新的鼓舞。神州不乏知音人。歌曲演唱者小彩舞，已经把这首歌曲列入了表演的保留节目。一个成功的电视剧插曲，会不会挽救一个濒临绝响的古老曲艺形式呢？人们已看到了这种转机，并正在思考着如何抓住和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国的其他古老艺术形式，也将从这个事例中，得到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启示。

在广大电视观众对《四世同堂》同声叫好的时候，文艺界又相应地出现了一股关于《四世同堂》电视连续剧的“讨论热”、“奖励热”和“宣传热”。不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热烈程度来看，这股热潮都是前所少见的。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许多文艺主管部门以及重要文艺报刊，都就这部电视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座谈会或讨论会。报刊杂志不断地发表了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介绍创作经验体会的文章。这类文章，已不下两三百篇。广播电视台、北京市和有关的文艺单位，纷纷给予摄制单位和创作人员以各种奖励，其中包括一九八五年的“飞天奖”的荣誉奖。《四世同堂》的演员，特别是那些在屏幕上有突出表现的演员，成了报刊上，特别是电视屏幕上风头十足的“热门新闻人物”。扮演“祁老太爷”的邵华同志，一生扮演了数十个话剧或电影角色。可是，他却在晚年以在《四世同堂》中的卓越表演，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闻人物。李维康同志的艺术生涯，是从京剧艺术开始的。迄今为止，她的艺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她的精湛的京剧艺术表演上。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观众却是通过《四世同堂》的“祁少奶奶”这个鲜明的艺术形象而认识了她，并且留下了超过对她作为京剧演员的深刻印象。

二

把《四世同堂》“热”，同我们文化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这一文艺现象或那一文艺现象的迷恋或狂热相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热”具有某些不同寻常的特点。它对于我们的社会、思想、文艺也发生着不相同的意义、作用、影响。

在日常的文化生活中，出现对某一种文艺现象的一时

的迷恋、轰动甚至狂热的情况，是经常的事。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于能给感官带来某种新鲜感受的因素，往往都会敏锐而又迅速地做出反应，并趋之若鹜。我们国家，曾经历了一个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时期。当对外开放政策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闸门，许多为我们所不熟悉的、新奇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也象潮水般一涌而入，使人感到千奇百怪、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于是，就往往出现一阵又一阵对这种或那种文艺现象的倾心、热衷和迷恋，并且频繁地、急剧地从一种“热”又转入另一种“热”。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出现过“参考片热”、“复映片热”。后来，又发生过《望乡》、《追捕》“热”。《姿三四郎》、《霍元甲》、《血疑》这些香港或国外的电视连续剧，也曾经或者因其艺术手法之新鲜、离奇，或者因其情节之惊险、紧张，或者因其反映男女关系上的缠绵和大胆，给人们带来了某种新鲜感受，在相当一部分观众中引起轰动或狂热。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热”，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那些维妙维肖地模仿西方或香港流行歌曲演唱风格的歌手们，几乎一夜之间冒了出来，突然成了歌坛上的“新星”。许多青年人象着了魔似地欣赏着那种他们过去很少接触过的表演风格和腔调。于是，电台、电视台、晚会，以至于招徕顾客的商店里，人们几乎只剩下听那一种调调了。“流行歌曲”磁带，几乎独占了录音带销售市场。“流行歌曲”，也几乎独占了音乐舞台。最近这一两年，文艺界的不少人又轮到因“通俗文学”热，“录像带热”的旋风般的袭来而感到忧虑并大声疾呼了。由于传奇、武侠、打斗小说的泛滥，使得严肃小说的出版发行遭到威胁。成千

成万部外国流入的录像带的冲击，比电视更加严重地威胁着电影院的上座率。

这些“热”在性质上、影响程度上并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可以认为，它们都是对于文艺上长期封闭、禁锢的一种反拨、一种惩罚、一种补偿。在一定意义上，它也反映了广大观众、读者对文艺的丰富多采那种饥渴般的强烈要求和愿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类“热”中，确实包含了一些盲目的、畸形的、饥不择食的、不健康的社会的和审美的心理因素。它们的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西方那种商业化的、格调不高的流行文艺的倾慕、热衷和仿效。

英国的作家保罗·哈里森，一九七九年曾出版过一本书：《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他根据其周游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观察的结果，向我们提供了在那些地方出现的“西方化热”，和由此导致的西方文化泛滥、传统文化“长眠地下”的令人深思的状况：

今天，西方化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没有西方化的人受到歧视，这一现象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它钻进当地社会的主动脉，从内部散发毒素……年轻人正在成为西方化的主要传播工具。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服装和生活方式就象当一个嬉皮士或者沉溺于滚石乐的花花公子一样。据说，这使他们显得高人一等，并有理由轻视自己的父母。娱乐设施也正在促进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西方摄制的电影渗透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大城市。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电视节目露骨地充斥着那种消费者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在印度尼西亚）那些

身穿西式服装头戴花里胡哨的帽子的印尼哼唱歌手跨在摩托车上，绝对逼真地演唱美国歌曲。如果本地节目不想显得太幼稚，太土气，也得模仿进口节目的方式和陈套。望着那些能歌善舞具有表演天才的人瞪大眼睛盯着低级庸俗的西方电视剧，实在叫人心里难受。民族文化本身并没有免疫力。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往往从高尚的、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堕落为庸俗的、商业化的闹剧和陈套。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病人膏肓，奄奄一息，在一些地方则已经长眠地下了。

作者在这里描绘的是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情景。我们在这里详细地引用了这一小段话，当然也绝不想把这些情况和我们这里发生的某些“热”等同起来。然而，我们仍然认为，他在这里说到的那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它也有助于对我们这里的某些“热”做出比较富有远见的判断。实际上，有些国际友好人士，早就对在他们国家过了时的东西、人们并不给以高度估价的东西，甚至那里的人们并不注意的东西，却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和狂热，感到难以理解。一些回国观光的爱国华侨，对于《上海滩》、以及酒吧间音乐那么盛行，也感到了担忧甚至痛心。可是，在文艺理论界，似乎对此并没有进行过比较深刻的分析，相反我们却听到不少人为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而有些从这种“热”中看到发财机会的人，不择手段地去炮制、推销那种商业化文化商品。这种情况，又为这种“热”，推波助澜，去赶时髦。

然而，这一类“热”毕竟是短命的，没有什么牢固根基的。因为，所有这一类的“热”，在很大程度上，往往

只是提供了某种对于我国观众比较新颖的艺术形式、样式、手法，或我们所不熟悉的外域生活、异国情调。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某种对人们感官上的比较强烈的刺激。任何艺术都要作用于人的感官。但是，能够刺激感官的却不一定 是艺术。否则，烈酒、鸦片、大麻叶，就可以成为最佳艺术品了。艺术的高低优劣，也绝不可以对感官刺激的强度而加以判别。因此，我们难以同意把追求“强刺激”看成是一种新的、健康的“审美趋势”的说法。仅仅追求刺激，就注定了那种“热”是维持不久的。第一次接触给人以新鲜感的东西，多次接触后，就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能够给人单纯感官刺激的东西，长期重复地使用，就会使人们的感觉器官变得迟钝和麻木起来，从而丧失其吸引力和刺激作用。当那些赶一时时髦的人，为迎合某些观众追求刺激的心理，而大量炮制那一类大同小异的产品，反复出现，以致达到泛滥成灾地步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加速了这种“热”的消退，使之丧失了令人迷恋和倾倒的魅力，甚至使人们迅速倒了“胃口”，对之感到厌烦和腻味了。曾经畅销一时的“流行歌曲”磁带，现在已经遇到了滞销的命运。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的歌星们，因为越来越失掉了对青年听众的吸引力，也开始纷纷另谋“新路”了。

这种对某一种新奇文艺现象迷恋一时的“热”，在范围上，也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说，陷入对某一种文艺现象的狂热的，往往只是观众或读者中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尽管这个数目可能比较大，但毕竟比较狭窄。这些人又往往是年纪轻、文化素养比较差、审美趣味

和分辨能力也不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构成，也是极不稳定的，很难形成比较明确、自觉、稳定、统一的审美观点和倾向。他们甚至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与此同时，我们的观众和读者中却也有许多人，对人们所热衷的那些东西并不感兴趣，甚至表示反感。同样他们对那种“热”，也并不以为然，感到迷惑难解，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甚至也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即使那些热衷于某种新奇文艺现象的人，在看法上也并不一致。上海的一次关于电影的青年观众调查，就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很有意思的信息：有些青年经常看那些没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内容惊险、打斗样式的影片。可是，他们声明，那不过是在劳动之余“看看热闹”轻松一下而已。他们说，如果要给这类影片郑重其事地打分，作出艺术评价，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予肯定的。

然而，这次出现的《四世同堂》“热”，却明显不同。如果说，以往出现过的对某些文艺现象的“热”，多数是出自对外来的、西方的、商业社会的某种新奇、刺激因素的倾慕的话，那么《四世同堂》“热”，却纯粹产生于我们的民族和社会的内部。它不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热”，而是对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热”。这种“热”又决不是基于某种对感官上的强烈刺激。因为《四世同堂》这部电视剧，绝不以其情节上的离奇、惊险、打斗所见长。它既没展示华丽、阔绰的排场、引人入胜的景物，也没有加入很多曲折、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的“佐料”，更谈不上有什么色情渲染。在艺术的处理手法上，这部电视剧也并不以其新奇取胜。人们甚至可以认